

# 社会流动与澳门对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辐射作用

赵立彬

[摘要] 澳门的开埠极大地改变了邻近地区华人社会流动的模式。尤其在19世纪,澳门邻近以香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出身寒微的华人,在当时澳门已经建立起来的交通系统和西方教育体制的基础上,达致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流动。通过走向域外,接受新的观念,输入新的思想,对于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变革,特别是在此影响下的进步政治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澳门在思想文化领域引领近代中国的显著的辐射作用。

[关键词] 澳门 社会流动 观念变革

[中图分类号] K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04-0122-07

澳门在思想观念、社会风气和生活惯习方面,曾对中国内地毗邻地区产生显著影响。近年来,澳门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和澳门对于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和政治运动的特殊作用,逐渐受到学界重视。<sup>①</sup>随着视野的扩大和探讨的深入,澳门对于近代中国思想观念变迁的意义,具备了从更高层面加以阐释的基础。本文从邻近地区华人社会流动的角度进行动态的考察,说明在文明接触过程中,澳门对于中国思想观念变迁的辐射作用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思想观念相互影响过程中的意义。

## 一、澳门作为面向中国内地思想文化辐射点的历史条件

澳门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变迁能够产生显著的辐射作用,首先是缘于澳门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传统中国文明之间的差异和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强烈扩张态势。澳门的辐射作用首先体现在中国内地的邻近地区。这一作用较早发生、持续影响,是与澳门逐渐建立起来的交通、教育、民间交往等各种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从16世纪开始,澳门就成为海上航线的一个重要据点,在早期是西太平洋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最初有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三条贸易航线。在此之前,以

---

作者简介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275)。

① 相关专著如:黄启臣《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主编《粤澳关系史》,中国书店,1999年。冯增俊《澳门教育概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指出西学东渐以澳门作为突破口,最先受影响的是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这是解释中国现代化的三大阶段都由珠江三角洲作为发端的最正当原因。邓开颂《澳门历史1840-1949》(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专门叙述了广东的历史名人与澳门。刘然玲《文明的博弈:16至19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特别关注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形成的关系。魏美昌《澳门文化的定位及其特殊功能》(《澳门教育、历史与文化论文集》,《学术研究》杂志社,1995年)论述了因澳门而发生的双向文化交流为中国近代先进人物提供精神养料,使中国文化开始出现了多元性。黄晓峰《澳门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特区”作用》(《中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指出澳门引发了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和民族精神之全方位而且极其深刻和深远的文明交往。卢丽燕的论文《澳门与近代中国革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和王敏的论文《澳门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理论学刊》2000年第1期)也论述到澳门与近代中国进步人物和运动。

中国为中心，已经有了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葡萄牙人的到来和澳门的开埠，使此后的太平洋航线，向西直达欧洲，向东通过西班牙美洲再同西班牙本土和欧洲连接，“使世界一体化开始从实践上变为现实”。<sup>[1] (P108)</sup>同时，澳门对于中国内地的交通也十分重要。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除少数时间外，澳门是广州唯一的外港。邻近的香山县以及周边其他府县的许多地方，无论出洋还是到广东省城或内地重要城市，都以澳门为中转。湾仔等地到民国时期，“往来中山内地之人，多取道澳门，形成与中山内地关系之隔膜。”<sup>[2]</sup>香港开埠后，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地位看上去似乎削弱了，但实际上，澳门对于沟通中国内地周边地区与外部世界的的能力，更多地体现在附庸于香港的更强大辐射作用上。在人员、思想观念的流动上，从原来的内地—澳门—世界转换成了内地—澳门—香港—世界，影响力的绝对值反而增加。

明清时期，尽管上层的中国士人，对于居住澳门的葡萄牙人，仍以教化相期，但民间交往并不理睬于此。在早期天主教传播时期，已有大量的中国人信教和传教的记载。据张汝霖记载，“唐人进教者约有二种，一系在澳进教，一系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居澳地，渐染已深，语言喜尚，渐化为夷”，这些人都取有“蕃名”，而“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惟顺德县紫泥人为最多。”<sup>[3] (P228)</sup>在华人教士谢玉的供词中，可以看到他如何在澳门由“西洋教主”给予名号，向广东人传教，在肇庆、新会、开平等地传过“种园做厨”的8人。<sup>[4] (P530)</sup>清初禁教期间，澳门成了本地教徒的进教之所，内地教徒的进教之地，以及对潜入内地传教的教士接引联络的津梁。<sup>[5] (P121)</sup>关于中国人信教的人数，统计各异，但反映了澳门教会对附近中国人产生吸引的基本事实。19世纪以后，新教的传教开始取得成效。<sup>[6] [7]</sup>到了近代，邻近地区新教的华人信徒数目有较大增长，可能远远超过了天主教。香山县自“咸同以降，彼人援内地传教约章，各县均次第设立，而县城教堂，前十余年始有之耳。其余各乡，或有或无。现调查得全邑耶稣教人约二千四百余名，天主教人最少，除榄都外，不过十数人而已。”<sup>[8] (卷 8, P2)</sup>外国的宗教给普通民众的信仰世界，带来了一些改变。1703年4月，鉴于邻近地区发生严重旱灾，澳门粮价暴涨，为此举行了一次场面盛大的涤罪宗教游行，随后又举行了两次。游行后不久，降了一场暴雨，这使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大为震惊。<sup>[9] (P70)</sup>在长期的民间交往和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域外的观念和信仰能够逐渐影响到中国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导致信仰和习俗的转移。

由于有外国人居居于澳门，为外人做工成为中外民间交往的又一种形式。为葡人充当舟师、翻译的人很早就出现了，清代澳门中文档案中大量记载了替澳门外国人修理房屋的泥水匠、木匠，以及在工商、服务业中的雇工。对于外国人雇佣中国人，中方本有条例禁止，但这一现象在澳门十分普遍，中国官府实际上也认可。《海国图志》记载：“外夷雇中国人供役曰沙文，故华夷有事，官府辄先以禁买办伙食及撤退沙文（即仆役——引者注）为首务。……必待事定，始开舱发沙文也。”<sup>[10] (P1985)</sup>许多华人妇女在澳门为外国人充当奶娘、帮佣。1832年，香山县丞发布告示，禁止中国妇女到欧洲人家中帮佣。1833年，又告示禁止中国居民为基督徒做轿夫。<sup>[11] (P53-54)</sup>这些禁令从侧面反映了华人到澳门为外国人做工和受佣的事实。到了葡萄牙人定居于澳门的“第二代人”的时候，中国人与葡人通婚的情况也出现了。大多数与葡萄牙人结婚的中国女子都不属于上等人，一般只是普通或较低层的妇女，与其通婚的葡裔族群家族亦不显赫，双方族群中只有那些较低层的人，才淡化族群的界限而相互通婚。<sup>[12]</sup>

澳门开埠后不久，由教会创办学校，兼授华人儿童。洋学堂不但免费，甚至还会向学生家庭提供金钱，这对邻近地区穷苦人家的孩童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新教的学校，在教育中国儿童方面成效更为显著。外国人兴办的学校在后来也促进了华人学校的兴起。虽然华人学校在体制上与西人开办的学校分属不同系统，但在教育精神、教学内容和形式方面，仍受到西式学校一定的影响，有明显的趋新取向。

## 二、澳门与内地华人社会流动性变化的新管道

凭借澳门的有利条件，内地邻近地区的华人世界，产生了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流动的可能。这种可能涵盖了从劳工、经商者、留学者到女性等各个社会阶层，他们在传统中国的社会里，活动范围狭小，达成向上的社会流动的管道十分有限甚至完全没有。而因为澳门因素的存在，他们极大地扩

展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并将外部世界的思想和观念输入中国。与上层思想关联密切且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近代留学生；妇女精英对传统中国思想观念的变革具有的意义特别引人瞩目。

澳门对邻近地区在观念上的影响，最初主要也不是通过上层人士来实现的。最先接触和接纳西式教育的，是平民百姓子弟。自澳门开埠以来，陆续有中国人得到机会到欧洲求学，早期主要是学习神学。在容闳之前到西方留学的人士，大多数都与澳门及附近地区有关。<sup>①</sup>

马礼逊学校的成功与澳门即有着莫大的关系。马礼逊学校前后共有4个班级，合计50多名学生。早期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澳门周围地区。从可知的马礼逊学校最早吸收的华人学生的情况分析，他们的家庭和生长环境及与澳门的关联，是他们能够进入新世界的初始渊源。这些华人少年能够在其后的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能不说首先得益于澳门。唐廷枢三兄弟的经历对此颇能有所说明。唐家湾的村民唐宝臣，因自己在澳门打工，故而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进了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长子唐廷植于1839年进创始班，次子唐廷枢于1841年进第2班，三子唐廷庚于1843年进第3班。<sup>[13] (P136)</sup>唐廷枢后来的事迹广为人知。唐廷植后来在香港政府中任职，在美国担任侨领，并接替唐廷枢出任怡和洋行总办，参与轮船招商局以及其他企业和福利事业。唐廷庚也供职于招商局，还参与过外交工作。唐廷枢“幼时偶与二三友人到澳门一游，将及澳，见官汛炮台房屋，枕行倾倒，志其故，为番人滋事所致。及抵澳，见番人楼台庙宇，宏壮可观，其炮台船只坚固，却与内地不同。”<sup>[14] (自序)</sup>因而感慨语言沟通之重要，“从师习英国语言文字，因留心时务，立志辑成一书，以便通商之稽考。”<sup>[14] (张玉堂序)</sup>以唐廷枢为主，三兄弟编撰了一部重要的工具书《英语集全》，对中国人学习英语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作用甚大。与外部世界的广泛交往产生了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受到良好外语教育的华人，有了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舞台上担任角色的机会，这在澳门有较多的体现。黄宽、黄胜和其他早期学生也是同样的情形。黄宽是香山县东岸乡人，父母早亡，和祖母一起生活，1840年11岁就读澳门马礼逊学校。后来赴英国学医，致力于把西医输入中国。黄胜家居澳门附近，1841年进入马礼逊学校，后来长期从事出版、翻译、教学工作。和黄胜、黄宽一同入学的“至少有两位是广州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其他几位也系校方付钱给家长后，始同意送来就学。”<sup>[15] (P14)</sup>

容闳的故事最为典型地说明了一个普通穷苦人家的孩子如何凭借这一新管道而出人头地。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与澳门接近，此地村民对于西方人，早已没有猜忌。因为外贸的发达，容家的父母很希望能有一个子弟学习英文，以便将来能谋一个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差事。在中国传教的郭士立夫人1834年来澳门创办女子学校，替郭士立夫人办杂务并兼任秘书的人，恰巧是南屏人，是容闳父亲的朋友和邻居，容闳的父母从他那里听到有关郭士立夫人学校的情况，于是通过他的关系并经他设法，将容闳送了进去。<sup>[16] (P1)</sup>正是因为这个机缘，容闳成为郭士立夫人的女子学校的学童。这种教育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读书进仕之途大相径庭。在澳门的学习使容闳有了很好的英文底子，而且了解了西方的基本文化知识，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润。容闳及同学的几名同学，英文表达能力到了完全可以不加删改地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水平，能以比较流利的行文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sup>[17]</sup>1847年容闳随布朗前往美国留学时，《中国丛报》刊登了6篇马礼逊学校学生的文章。他们所发表文章的主题，分别是：《人生是一座建筑，青年时代是基石》、《中国政府》、《劳动》、《一次幻想之旅》、《圣经》、《中国人关于来世观念》。从这些标题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维世界已经远离了传统教育下的中国青年。

从自身的教育经历所达致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中，容闳看到了西方教育对于改变中国青年命运的巨大能量。“容闳博士回归中国最大的心愿，是创立一个出洋机构，使中国学生能够出国留学，用外面的知识装备自己，树立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使之能在为祖国服务中担得起负责的岗位。”<sup>[18] (P1)</sup>容闳在1870

<sup>①</sup>有关早期中国人留学的情况，参阅吴义雄《容闳之前中国人留学海外寻踪》，载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编《容闳与科教兴国》，珠海出版社，2006年。

年代组织幼童留学，带来了新的社会流动性的突破。如果说容闳是从澳门直接走向世界，那么他主持的幼童留美，间接地反映了澳门对邻近地区的长期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幼童张康仁是容闳的家乡南屏人。幼童蔡廷干幼年在唐家寄居读私塾，其父蔡召佐曾在天津学习机器，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sup>[19] (P161)</sup>梁如浩（经唐廷枢推荐成为第三批幼童）是唐家人，梁如浩的伯父是上海殷商。幼童邝荣光的父亲曾在澳洲金矿担任矿工，小有积蓄，希望儿子能够成为矿冶工程师。他的叔叔邝其照，是《英文成语词典》的编著者，容闳的朋友（邝其照后来以“参军”名义率第四批幼童赴美）。幼童唐国安是香山县唐家湾唐氏家族的子弟，唐氏家族在马礼逊学校时代就有三位子弟就学于澳门，并与容闳熟识。幼童唐绍仪是唐廷枢的侄儿。幼童容揆、容良（尚谦）、容尚勤，是容闳的侄儿。容耀垣（星桥），是容闳的堂兄弟。容星桥从四岁开始，就略懂英文，并受过洋人老师的指导，因而被容闳选入第三批出国。<sup>[20] (P89)</sup>幼童吴其藻是香山县翠微村人，他的祖父经常到澳门，父亲吴悠远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在澳门行医时遇见正在招收幼童的容闳，便把长子吴其藻托付容闳带到上海应考，成为第四批留美幼童。<sup>[21] (P76)</sup>

可以看出，多数幼童在留学前，处在传统文化的边缘、同时又是与外部世界有较强联系的地位上。幼童留美的事业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但就幼童个人而言，人生轨迹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幼童到美国不久，习惯兴趣、生活方式迅速“美化”，言行举止酷似美国人，回国后这种改变仍然根深蒂固。容尚谦记叙过，即使是穿着标准的中式服装，一言不发，但也立刻会被别人与一般的中国人区分开来，因为“你的男子汉的仪表和走路姿态，使得你的表现同一般人不一样。”<sup>[18] (P18)</sup>多数幼童在各自的领域中，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二批留美幼童唐国安，后来成为清政府为备“庚子赔款”学生留美学习成立的“游美学务部”的会办、清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复活和延续了容闳当年的留美教育计划。由容闳开启的大规模的留学运动打开了知识界的风气，转变了国人的观念，带动了高层次的思想的输入，在近代中国思想变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三、澳门与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迁

澳门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进步有密切的联系。广东能产生一批很有影响的趋新人物，是澳门持续向中国内地特别是邻近地区发生思想辐射的必然结果。澳门因素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和新思想的输入，是这一地区代有人才、首倡革新、影响全局的基础。这一过程体现出阶段性，但整体上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受西方影响并逐步与世界融为一体的产物。

澳门是中国人早期获得新的世界知识和世界观的渠道。《万国舆图》就是明末利玛窦从澳门带进中国的。清初康熙帝利用澳门作为渠道，大力吸收西方科技及其人才，澳门成为西方来华科技人员的立足点、预备站和候聘所。<sup>[22] (P166-167)</sup>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许多“第一”都与澳门有关，西医也是最早从澳门传入中国，并将因西医带来的一些新的生活经验从澳门传播到周围广泛的地区。1837年郭雷枢博士在澳门首开一家眼科医院，免费为中国人解除疾痛；<sup>[23]</sup>1838年，医务传道会澳门医院为700名中国人进行了治疗。<sup>[24]</sup>一般来说，接受传教医生和传教士治疗的人，大部分是社会下层无力负担医药费用的群众，或是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的病人，但在澳门，西医受到了包括上层华人在内的人士的接受。孙中山从香港毕业后到澳门行医，当时澳门镜湖医院为澳门绅商公立，一向使用中药治病，孙中山经邑人吴节薇介绍，“迭请该院兼用西医西药，以济中医所不及，并愿担任义务，不受诊金。该院绅商感其高义，竟破例从之。”<sup>[25] (P72)</sup>孙中山在澳门行医还得到上层人士的大力帮助，“澳门中国医局之华董所以提携而嘘拂之者无所不至，除给予医室及病房外，更为予购置药材及器械于伦敦。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尝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门始。”<sup>[26] (P50)</sup>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派人在澳门收集世界各国资料，辑有《四洲志》。与容闳同在马礼逊学校求学的周文，入林则徐幕，负责翻译英文书报。在此基础上，而有魏源的《海国图志》，《海国图志》的知识和观念，得益于澳门者甚为明显。出生于澳门的玛吉士（J. M. Marques）是圣约瑟修院培养的杰出双语人才江沙维（P. J. A. Goncalves）的学生，他撰写了《外国地理备考》一书，于1847年出版。该书对于

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士大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中内容的大部分被编入魏源的《海国图志》，其影响及于日本的明治维新。<sup>[27](P63)</sup> 魏源对该书评价甚高，表示：“近惟得布路国人（指葡萄牙国人——引者注）玛吉士之《地理备考》，与美里哥国人高理文之《合省国志》，皆以彼国文人，留心丘索，纲举目张。而《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智。”《海国图志》中引录该书 91 处，辑录 12 万字，并收录玛吉士的《天文地球合论》以“资博识，备利用”。<sup>[28](P7-8)</sup>

澳门本身没有产生多少重要的思想，但是对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潮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892 年，郑观应在蛰居澳门 7 年之后，完成了他的系统的维新著作《盛世危言》（1894 年刊布）。郑观应虽然对澳门的社会弊端多有批判，但这部著作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反思，又基于传统主张改良。该书影响之大，“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sup>[29](P91-92)</sup> 此书由礼部尚书孙家鼐推荐给光绪帝，并由光绪帝诏命颁发群臣阅览，后来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毛泽东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联络澳门巨商何廷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内地多个省份的官员通令各级官员、士绅、书生订阅该报。

澳门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共和革命思潮的兴起。澳门不仅是孙中山走向世界的门户和踏入社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舞台，而且是他多位亲友长期居住的地方。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县翠亨村，地处广州和澳门之间，林百克在早期作的《孙逸仙传记》中描述道：许多广州澳门的富翁因翠亨有很好的风景，可以赏玩，并且离城又近，交通便利，所以都在这里建筑了别墅来住着。<sup>[30](P4)</sup> 这可能不尽属实，但翠亨容易受到澳门的影响，却是无可置疑的。孙中山的父亲曾在澳门做过裁缝，积钱以应家用。他的两个叔叔和哥哥孙眉亦远赴美国。1878 年，孙中山 12 岁的时候，从澳门启程去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sup>[31](P47)</sup> 青年孙中山在香港就学，频繁往来于香港、澳门和家乡之间，毕业后到澳门行医。他在澳门的交友、撰述和上书等活动，锻炼和发展了他的政治意识，并向革命思想发展。从澳门走出的容闳最初持改革中国的思想，曾向太平天国提出过以西方世界为原型的改革的建议。1900 年上海张园“国会”中，他当选正会长，起草对外宣言，宣示要建立 一个以英国政府为模式的“立宪政府”。此后，他在香港参与兴中会的活动，说服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银行家布思赞助孙中山革命。容闳多次向革命党人提供建议，辛亥革命发生后，已经中风的容闳极其关心革命的前景，向孙中山表达了诚挚的祝愿和对局势的提醒，表示非常想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sup>[32](P326)</sup> 并介绍自己的儿子为这个新共和国服务。容闳带出的幼童中，直接参与革命的比较少，容星桥与革命党人联系较多，而唐绍仪在革命发生后，对于共和的结局有重要影响。

澳门对于内地邻近地区女子的社会流动性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影响也很显著。前面所述的各种人员流动中，女子都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鸦片战争前，“广东民人多有潜入天主教者，香山等县妇女亦多习教。”<sup>[33](P528)</sup> 1835 年郭士立夫人创办女学，“起初只收女生”。<sup>[16](P4)</sup> 维新时期，在澳门的女子教育的兴办和鼓吹女子教育的舆论引人瞩目。郑观应《盛世危言》特别列出《女教》一章，提倡禁裹足、兴女学，使女子“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sup>[34](P288)</sup> 这一观念为维新时期的康梁所继承。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 1898 年在《知新报》发表《女学利病说》，宣传维新派的女子教育主张。康有为的弟子陈子褒前往澳门办学，创办“蒙学书塾”（后改名为“灌根书塾”），“以学校教育，必本于家庭，而妇女不识字者居多数，亟倡女学，期造就平等之智识”，<sup>[35]</sup> 他将女子教育与国势的盛衰联系起来，在所编课本中对女子说：“书不读，是蠢才，蠢人多，国就衰。”<sup>[36](P4)</sup> 陈子褒提倡女学，期望“家家明理，人人有德，风俗人心，转移可必”，<sup>[37]</sup> 并不是提倡革命。但他的受业女学生中，却有许多人在共和革命中有突出的表现。其原因并不是她们所受教育的内容给予了革命思想，而是教育使她们走出传统社会的羁绊，扩大了视野和社会活动的天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比教义更重要的，是社会流动性本身影响到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参与实践的程度。辛亥革命前夕，一些原在澳门子褒学塾读书的女学生许剑魂、梁国体、陈秉卿、严淑姬等先后参加了同盟

会，在辛亥广东的光复中有突出表现。这些事例典型地反映了女性因为澳门的关系而凭借新的社会流动管道，从而在思想和政治活动中有所作为。

#### 四、结论

社会流动一般是指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改变，狭义而言，是指在社会阶梯上的流动。<sup>[38] (P444)</sup> 传统中国改变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主要渠道，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科举考试因向平民子弟开放，被何炳棣等史家认为在社会流动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明清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是在相当程度之内以科举考试为主要渠道的”。<sup>[39] (P28)</sup> 理论上，这会对大多数人产生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吸引力，在许多情况下，地位低下的人甚至需要隐瞒和违规，或借助于各种方式来获得体制内的关键性要素，来进入这一体制内的社会流动程序。明代以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族群群体性地改变、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充分运用了国家体制中的户籍的改变、借助于某种宣示手段、通过文化的操作来进行，以获得官方的认可，<sup>[40]</sup> 都反映了处于传统社会边缘的人们希望满足资格条件、达致体制内社会流动的需求。但除了这种最基本的身份门槛外，还有经济上的因素制约。潘光旦、费孝通和张仲礼认为，科举成为社会流动的途径并不宽大，利用科举在社会阶梯上上升，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科举制度确实使某种“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但是实际上对于那些有财有势者却大为有利。<sup>[38] (P444) [41] (P202)</sup> 尤其在广东沿海地区，平民百姓本来居于社会底层，往往因为身份上、经济上的原因，无力向子弟提供教育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无法通过“正途”取得功名。由于澳门因素的存在，逐渐产生了主要依靠体制外的因素达致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而且社会地位晋升的评判标准，也发生了以体制外因素为主的根本变化（这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日益显著）。澳门对于中国内地的思想文化辐射，就是通过这种流动来实现的。在传统体制边缘的人们，走出封闭的生活空间，将从外部世界带来的观念传播入中国，并通过自身社会地位的改变，来实现新的思想观念向更高阶层的影响，推动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迁。

自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的历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各个地方的历史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整个世界联为一体，成为“世界历史”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观念开始突破国家和区域的限制，不再与原有的地理空间、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固定地联系在一起。近代中国思想观念也显示了“流动空间”代替了“区域空间”（借用阿兰·伯努瓦关于资本与政治的论述的概念），<sup>[42]</sup> 日益受到域外的因素和资源的引导，产生强烈的非本土化的趋向而“远采泰西”，世界范围的思想观念联系日益显著。在这一基础上，思想文化不仅能够领先和引导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而且具有将传统中国带入世界、与世界产生更紧密联系的巨大意义。正因为如此，澳门虽然是弹丸之地，然而在世界文明史的地图上，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参考文献]

- [1] 何芳川. 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2] 何大章. 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 [A]. 中山县文献委员会. 中山文献 [M]. 创刊号，1947.
- [3] 张汝霖. 请封唐人庙奏记 [A]. 澳门纪略·卷上. 澳门问题史料集（上册）[M]. 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
- [4] 中国教士谢玉关于本人习教传教经历供词残件 [Z]. 刘芳辑，章文钦校. 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M]. 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
- [5] 章文钦. 澳门与明清时代的天主教徒 [A]. 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 [M]. 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
- [6] 吴义雄.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 [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 [7] 汤开建，张照. 英国循道公会澳门档案中的早期传教士活动 [J]. 中国文化研究，2004，（秋之卷）.
- [8] 香山县乡土志 [M]. 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影印，1988.
- [9] 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M]. 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

- [10] 魏源编, 陈华等点校. 海国图志 (下册)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8.
- [11] 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19 世纪) [M]. 澳门: 澳门基金会, 1998.
- [12] 周大鸣. 澳门的文化多元与和谐——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讨论 [J]. 中山大学学报, 2007, (3).
- [13] 唐绍明. 唐国安是唐廷枢之子吗? ——有关珠海唐氏的三则史实 [A]. 珠海文史 (第 16 辑) [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文史委员会, 2006.
- [14] 唐廷枢. 英语集全 [M]. 1862 年纬经堂刻本.
- [15] 勒法吉著, 高宗鲁译. 中国幼童留美史 [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 [16] 容闳著, 王蓁译. 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17] 吴义雄. 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 [A]. 吴文莱主编.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C].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 [18] 容尚谦.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 [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 [19] 唐有淦. 蔡廷干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文史委员会. 珠海人物传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 [20] 唐仕进. 容星桥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文史委员会. 珠海人物传 (下册)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21] 吴达文. 留美幼童吴其藻及其家世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文史委员会. 珠海文史 (第 16 辑) [M]. 2006.
- [22] 韦庆远. 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对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的评介 [A]. 澳门史论稿 [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3] Medical Philanthropic Society [J]. 中国丛报, 第 10 卷第 1 期.
- [24]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J]. 中国丛报, 第 7 卷第 8 期.
- [25] 冯自由.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 [A]. 革命逸史 (第 4 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26] 孙中山. 伦敦蒙难记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 孙中山全集 (第 1 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27] 冯增俊. 澳门教育概论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 [28] 魏源编, 陈华等点校. 海国图志 (上册)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8.
- [29] 新闻日报, 1897-03-02. 转引自夏东元. 郑观应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 [30] 林百克著, 徐植仁译. 孙逸仙传记 [M]. 上海: 开智书局, 1926.
- [31] 孙中山. 致翟理斯书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 孙中山全集 (第 1 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32] 谢缵泰.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 [33] 广东布按两司为严禁拜会入教事行各府县札抄件 (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初三日, 1814 年 3 月 24 日). 刘芳辑, 章文钦校. 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下册) [M]. 澳门: 澳门基金会, 1999.
- [34] 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 (上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35] 崔师贵. 陈子褒先生行略 [A]. 陈子褒著, 冼玉清等编. 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 [M]. 广州: 约为 1952 年出版.
- [36] 陈子褒. 女儿书·改良妇孺三四五字书 (卷下) [M]. 广州: 华兴书局, 出版时间约为民国初期.
- [37] 陈子褒. 妇孺八劝·劝妇读书 [M]. 文华阁明心宝鉴 [M]. 佛镇大地街, 出版时间不详.
- [38] 潘光旦, 费孝通. 科举与社会流动 [A]. 费孝通文集 (第 5 卷)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 [39] 何炳棣. 读史阅世六十年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40] 萧凤霞, 刘志伟. 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4, (3).
- [41] 张仲礼. 中国绅士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 [42] 阿兰·伯努瓦. 面向全球化 [A]. 王列, 杨雪文编译. 全球化与世界 [M]. 北京: 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郭秀文